

正月里来正月正

□刘锡诚

“正月里来正月正，家家户户挂红灯……”离开故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，儿时的许多人物和事情，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了，惟独过年的那些事儿，买年画啦，写对联啦，贴门神啦，祭灶王啦，接财神啦，祭祖啦，守岁啦，拜年贺岁啦等等，却还清晰地刻印在脑海里。因为春节对乡民们来说，不仅是喜悦的、欢乐的，也是神圣的、神秘的。

凡是神秘的事情，尤其是神圣的事情，一旦经历过、体验过，是不会轻易忘记的。就说送灶王升天爷的仪式吧。腊月廿三晚上，旧的灶妈被从碗柜边的墙上揭下来，把新买来的灶妈换上去，并把供品——关东糖摆好。家长默默地走到黝黑的天井里，把旧灶妈烧掉，让灶王爷随着火光的升腾回到天上。一边烧，一边念念有词地说：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降吉祥！”嘱咐灶王爷升天不要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家里的坏话，祈求全家来年平安吉祥。乡俗认为，灶王爷不是神，是家庭的一员，有的灶妈还一左一右画有两个老婆，但他能通神，是个人神中间的人物，而关东糖是可以把他的嘴巴粘住的。祭灶仪式固然简单，可是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，却以为灶王爷真有这样大的本事，全家的祸福，都掌握在灶王爷手里，尽管民间传说里也有不少是奚落他的。

守夜也很有神秘感。除夕晚上，家家户户都要守夜，把大门关闭，上了门闩后，天井里要撒上芝麻秸（我们那里俗称撒辟）。芝麻秸干燥，踩上去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。祭拜也是家家户户不能少的礼仪。中国是个家族伦理社会，向长辈贺拜和向平辈致意，表示对家族秩序的认同和遵从。向邻里朋友贺拜和问候，表示团结、和睦、友善、祝福的意愿。这个传统，在今天，也是我们要坚守的。

除夕晚上祭祖，初一早晨贺拜。一是对逝者，一是对生者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祭祖是家家户户不能少的程序，表示追念先祖先人的艰难创业和高尚品德。贺拜也是家家户户不能少的礼仪。中国是个家族伦理社会，向长辈贺拜和向平辈致意，表示对家族秩序的认同和遵从。向邻里朋友贺拜和问候，表示团结、和睦、友善、祝福的意愿。这个传统，在今天，也是我们要坚守的。

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、民族众多的国家，春节的民俗和风尚，不同地区自然也略有差异。各地春节的民俗风尚色彩斑斓，不仅是地域文化的构成部分，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表征之一。南方的，如鲁迅在《祝福》里描写的绍兴城里鲁四老爷家过春节，张灯结彩、祭祖仪式，以及在鞭炮声中辞旧岁迎新年的场面，那是清末民初江南一带人家过年时的情景。茅盾在《香市》里描写的家乡乌镇的香市，四乡的农民摇着赤膊船，成群结伙、摩肩擦背地来到社庙前，赶香市，有的背着香袋，有的拎着香篮、带着香烛。他们先到社庙里拜菩萨，再到水潭里汰“蚕花手”。那些茶棚，戏法场，弄缸弄瓮，走绳索，三上吊的武技班，老虎，矮子，提线戏，髦儿戏，西洋镜，百草

父母在车上

□郑小琼

出来多年，很少回四川过年。每年年三十那天打电话回家，母亲总在电话那端叹息，好些年里家人都没有聚在一起过年了。今年弟媳在广东生小孩，父母来广东过年。

父亲在贵州，母亲在老家，弟弟、弟媳和我则在广东东莞打工。母亲很少出乡，父亲也没有来过广东，确定好父母来广东过年已有一月之余。在这一个月，母亲几乎天天打电话过来，问广东的天气，要坐多少的车，坐火车还是汽车，然后担心房子没人照看。她犹豫不决地唠叨着。虽然这样，从母亲的声音依然能感觉她的高兴，她每次在挂断电话前，总会不经意地说一句“一家人总算可以聚在一起过年了”。

父亲从贵州提前赶回四川，原本坐火车，后来见母亲准备了太多的东西，决定坐长途汽车来广东。车从南充出发，司机说会过我的常平镇，到时去车站接他们就行了。

舅舅把父母送上车，然后便打电话告诉我，父母上车了，大约第二天晚上六七点便可到常平。舅舅又在电话里把长途客车的车牌号、司机的电话等等都告诉了我，嘱咐我，一定要到常平汽车站接父母；末了，又叮嘱我，他们到了就报个平安。他再三嘱咐，很是仔细。坐在车上的母亲从舅舅的手中接过电话，又把话重复地说了一遍，她还是没有点不放心，怕我出错。其实我早已记好。况且，长途汽车经不过常平，我还不肯肯定。出来这么多年，早已见惯了，但是怕母亲放心不下，还是附和着她。母亲在电话那端说了好几次，直到快开车时，才把电话挂上。电话这端，我说我会提前打司机的电话，让母亲宽心。

我在计算着父母的行程，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，她又晕车，要坐这么久的车，不知她会呕吐成什么样子。我心里隐隐作痛。但是想到明日即可见到他们，心里稍稍有点安慰。我终究还是不能放心他们，想打个电话给司机，却不敢拨号。枯坐在桌子前面，想象着坐在长途客车上的母亲，她肯定脸色苍白、头发蓬乱。载着父母的那辆客车此时正穿越中国西南大地，玻璃窗外是冬日西南的风景，山坡、空荡荡的庄稼地、树木、河流……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着，公路两边的景物如幻灯一样不断地划拉了过去。不晕车的父亲在做什么呢？他除了要照顾晕车的母亲，还做什么呢？

梨膏糖，花纸，各式各样泥的金属的玩具，灿如繁星的“烛山”，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，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。北方的，像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描写的荣宁二府除夕前打扫房屋，更换门神、对联和重油桃符，使门庭焕然一新，以及新年放花炮的欢乐气氛，那是旧时富家豪门过春节的大致情况。老舍在《北京的春节》里写的则是普通北京市民过春节的景象和老北京人的心理，他说，腊八那天人家里和寺观里熬制和分赠腊八粥，“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，可是细一想，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”。中国的春节，色彩缤纷，风俗各异，而它的文化指向却是一样的：平安吉祥。

春节的文化意蕴，除了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以外，古人还曾赋予它一些其它的深厚而广泛的意涵，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些逐渐被遗忘了，有些被遮蔽了。譬如，周天子在元日这一天要祈谷于上帝，要扛着耒头到田地里耕作，因为立春之日东风解冻，后五日，蛰虫始振，再后五日，鱼上冰，五谷开始发芽生长了。还要祭祀社稷，向农神祈愿。农神是哪一位呢？相传是句芒。又譬如，《史记·天官书》里说，“凡候岁美恶，谨候岁始。”《正义》云：“以四时之日，候岁吉凶也。”所谓“候岁美恶”、“候岁吉凶”，是说如果正月且晴天，预示着来年一年丰收。古代有“正月且洪八风”之说，即：如果风从南方来，预示着一年大旱；风从西方来，预示着一年中将有兵祸；风从东南来，预示着“民有疾疫”，是岁恶；等等。针对着这一系列文化涵义，人们又制定出了一系列的对策。譬如元旦（春节）这一天，“先于庭前爆竹……贴画鸡户上，悬苇索于其上，插桃符其傍，百鬼畏之”（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）。在这一天还要悬羊磔鸡，以压疠气。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节日风俗，如周处《风土记》里记载的拜年之俗：“元日，长幼悉正衣冠，以次拜贺。”《列子》里记载的放生之俗：“邯郸之民，以正月且献鸠于简子，简子厚赏之。”这种合乎环保理念的放生活动，在邯郸而为春节之俗。这一系列有关春节的文化意涵，所显示的，是浓重的农耕文明的色彩。属于物候的，应当是古人科学观察的总结；而属于巫术的或禁忌的，当可供认识和梳理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。

庚寅年（2010）春节，在我国全球化、现代化、城镇化的脚步声中来临了。我们常说“新春佳节”；古人说“睹芳节兮嘉时”！人生易老，岁月无情。尽管人生无法再回到童稚无邪的年月，关于春节的理念和春节的过法也已今非昔比，但春节所固有的那些或隐或显的意涵，却让我一次次重温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与鲜活。

载着父母的车此时该到哪里了？过南充，到重庆，然后是长寿、黔江、涪陵……每次回去我都是坐火车，要经过这些地方。整个下午，我都没有心思做事情，想象着载着父母的那辆客车，我在百度上搜索着；看看钟表，计算着他们该到哪里了。

直到半夜，我都没有睡好，想着父母明天就过来了，也担忧他们坐的这辆客车。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，她有一个习惯，天黑便睡觉，一大早就起来，忙里忙外。从没有熬过夜的母亲是如何度过在长途客车上的这一晚。不知她有没有睡着，夜里会不会受凉，晕车是不是好了一点。窗外是繁华的东莞，而远在千里之外，有一辆载着父母的客车正在黑暗中穿过旷野、隧洞、桥梁……深冬的西南大地上，应该是一片萧瑟的风景，冷的山野，冷的收割后枯湿的大地；冷得河流蜷缩，冷得落叶树只剩枝条，常绿树也缩成一团，连天空的月亮都是冷的，悬挂在车窗外那边的山梁上，照耀着沉睡的大地。大西南的公路蜿蜒曲折，错落有致的村舍无声地向后退去，拥挤的客车上疲倦的旅客昏昏入睡。不知晕车的母亲此时如何。

父母离我越来越近了，过了贵州、湖南、广西，进入广东境内了。下午四点，打电话问司机，答七点可到；再问是否到常平车站，答肯定。在外多年，经常听说长途客车种种不是，把乘客扔在路口，或者根本不经过乘客要到的地方，中途倒卖等，终归不放心。父母初来广东，又问了几句，司机答复是肯定的。六点钟，在老家的舅舅打电话问是不是安全到达。我再问舅舅客车发往哪里，得知客车终点站并非东莞，而是深圳，我又不放心了，这车肯定不会到常平车站。但是舅舅在电话那端肯定地说，司机说一定到常平车站之类，我不再说话。只有打电话给司机，司机说要八九点才能到东莞，电话中他不再提常平，而父母肯定不知这辆车把他们扔在哪里。我暗自埋怨父母为什么不坐火车，这样夜晚把他们扔在陌生的路口，会不会有什么意外。

直到七点，司机才说他们只能在黄江高速路口下车，大约8点半左右才能到那里。黄江高速路口在哪里，我不知道。虽然来了东莞8年，我对东莞的印象依然很模糊。东莞这几年变化太大了，这座只有100多万户籍人口的城市，却有着1000多万如同我一样来这里打工寻梦的外来者，他们中绝大部分的人都留在这个城市过年。

黄江高速路口，8点半左右，我唠叨着。下楼。找车。去黄江路口接父母。

面包车。司机是广西人。他知道黄江高速路口在何处。离我住的常平大约40多分钟的路程，不是很远，可是天已经黑了，不知父母如何。倒是这位广西司机不断地安慰我，说他经常去那里接人，没有关系。交谈中，得知他来东莞11年，过年也不回家，留在东莞过年。

天黑了，整个城市灯火辉煌，霓虹流光溢彩。坐在车上看

从小到大，春节对于我来说都是遥远的。

小时候的日子特别慢，一天一天老也挨不到过年，春节祭祖祈福辟邪的古老含义概不明白，至于岁末出现的猛兽“年”，对于童年的我来说，更像是遥遥企盼的福星。长大了，离家外出独自谋生求学，春节回家要倒许多次车，没有一两天的时间是不够的用的。时间的尺度转换为空间，赶车辗转回家的路程，最直接地丈量着春节的距离。下乡的时候，有一年就没有回家，是和一女友在农场过的。结婚以后，多数春节都要到婆家过，尽管不用倒车，但长途旅行也觉得春节遥远。

走在生命的下坡路上，回望童年的春节，实在有意思。年前就开始准备，和弟弟到车站接远道归来的父亲。随了院子里的大姐姐，到镇子上的小铺买供应的年货。大了一点，独自乘车到城里买无需票证的食品。帮助父母归房子，拾掇各种年夜饭的原材料。父亲会带回各种礼物，每人一份，还有必不可少的——一幅画。他工作的地方，以出年画著名，但是他带回来的画没有传统的题材。记得有一年，是一幅冰雪青松衬托着持枪骑马的战士，而且还是带挂轴的，很足气派。弟弟十分喜欢，高兴得在床上跳来跳去地看不够。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，有鱼有肉，有带蛋饺的什锦大锅。只是素淡惯了，吃不了几口，便没有了食欲。或者是为了饭后的玩耍，草草吃点儿，就跑出去玩儿，很对不住父母连日准备的辛劳。弟弟们喜欢放鞭炮，大多是最便宜的小红爆竹，也有牛皮纸卷成的大炮竹，小指粗。小红炮竹响起来如黄豆在锅里炸裂，大炮竹则像电影中的枪声。女孩儿多是凑在一起玩翻绳，以简单的手法勾动一根两头系在一起的棉线绳子，变出各种不同形状的几何造型，并且有相似的名称，诸如丝糕、茅坑等等。也有玩撒棍儿的，把五颜六色的细竹签子戳齐以后，自然撒手散开，用一根相同的竹签，小心挑取搭在上面的，不碰动其它的竹签子则可据为己有。几个人轮流，以得竹签多的人为赢。点上灯笼跑着玩，则是男孩儿女孩儿共同的游戏。印着各种花卉动物图案红黄绿硬皱纹纸，折压成可以伸缩的各种几何形状，以圆筒形居多，也有椭圆的、菱形的，里面插上一只小红蜡烛，小棍儿一挑，有弹性的灯笼就自然垂落，颤颤悠悠地晃动，烛光透过花纸照出一小团儿茸茸的光，也是颤颤悠悠的，排着队跑起来，就有一串儿颤抖着的茸光，在夜色中流动。经常是几条茸光，伴随着“点灯笼喽、点灯笼喽”的齐声叫喊，在房前屋后游走，不时爆发出哭声，便是有孩子摔倒了。如果火光骤起，迅速落地，逐渐熄灭，就是灯笼的纸罩被点燃了。大风的除夕夜，这种情况最多，多数年头，一根蜡烛燃完了，喊声也随着茸光的散尽熄灭而平息。一般的家庭，一年只买一个灯笼，孩子多的人家轮流玩儿，所以，仍然以男孩子玩儿的居多。我是一个不会玩儿的孩子，也没有耐性，所有的游戏看着的时候多，不大能参与。点灯笼带给我最大的快乐，是可以欣赏花纸上

——编 者



遥远的春节

□季红真

的模式。就是年过完了，母亲也会把灯笼挂起来，点缀简陋的家。

除了丰盛的年夜饭，我家的春节大概过得要算简单的。院子里的当地人，不上班的主妇们，腊八时，就用醋泡好了蒜瓣，准备初一吃饺子。有的人家把蒜瓣用细竹篾子穿起来，盘在存水的大盘里，蒜芽儿发起来，一盘嫩绿十分喜人，三十晚上，剪下来和肉一起包饺子。把通红的圆萝卜切掉头，挖出里面的肉，盘上蒜瓣，或者放入一棵白菜根，菜芽会发成一棵鲜嫩的小白菜。用绳子穿好挂起来，红是红绿是绿，成为赏心悦目的清供。腊八蒜也从心里往外透着绿，这简直就是春的信息。

守岁是春节从古到今最恒常的内容，而我们家的孩子从来守不住岁，一个比一个能睡。那时候，家里没有电视，除了玩一会儿扑克牌以外，很快就东倒西歪地进入了乌有之乡。通常是被母亲唤醒，催促着穿上新衣服，那时候，最高级的衣服是灯芯绒了。然后，一人一碗炒年糕；有的时候，是老家寄来的黄果，是用草木灰泡过的糯米年糕干，用水发开再炒。这也是我们和别家不一样的地方，别家通常是吃饺子。然后，收拾碗筷，把待客的零食摆上，通常是瓜子、花生和水果糖，零食也是在这几天吃得最多，稀罕的是粘牙的糖瓜，拜年的人是走得近的人，彼此相约着挨门挨户地串，除了同事家就是平时为大家服务最多的人。院子里住着一位老校医，平时经常义务为大家打针看病。到他家里拜年的人最多，有的时候，大家还凑一点钱，买一幅画，贴上有贺词的红包，送到他家里。有一年，送的是京剧《打金枝》的整幅连环画。下午基本上就没有拜年的人了，和母亲上街，沿途可以看到各种年货摊子，有卖年画的，有卖馓子、泥人一类玩具的，还有卖糖葫芦、冻柿子之类时令果品的。一路走下来，被商品的花色搅和得劳累不堪。剩下的时间，就是和小朋友们玩跳皮筋一类游戏了。还有就是听母亲讲闲话，这一天的话题必是老家过年的事情。老家在偏僻的山里，禁忌特别多。过年的时候，不能扫地，怕把财气扫走了；正月初一，不能喝菜汤，否则一年里出门都要遇雨……

成长的过程，是春节的内容不断减少的过程。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破四旧把所有的节日礼俗都扫荡了。人家最大的差别，就是都以红太阳为年画。经济受到制裁，每年一身的新衣服也免了。没有了拜年一说，桌子上的零食也不必准备了，更不用凑份子送礼。惟一保留的节日，就是年夜饭。母亲仍然殚精竭虑，把这一顿饭做得很像样。这就是母亲的伟大之处，永远以平实的态度对待社会的动荡，尽量维持一家人的饮食水平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开始用心，因为没有了玩儿的念想。长达10年的岁月，春节的概念就是这阖家团圆的一顿饭。能够凑齐已经不易，有好几年，人都到不齐。有一年，父亲在乡下插队，母亲回老家省亲，兄妹五一起张罗年夜饭，竟也摆了一大桌，让来探望的邻居惊异不已。出嫁以后的年就更简单，公公婆婆都是教会学校出身，主的训诲中没有春节一项，过年真正只剩了一顿团圆饭，连年画也免了，打扑克则人手凑不齐。只是饭后，要包饺子，守岁过凌晨，煮一些充饥，余者冻硬放进冰箱，留作每天的饭食。

最冷清的一个春节，是童年的一次，母亲南归，一向节俭的父亲带着我们过年。所有项目全部削减，连那一顿饭也马马虎虎，那个年好像没过。最丰富的一个春节，是70年代末，父亲平反了，我和弟弟考上了大学，母亲终于从半生的政治阴霾中走出来。团圆饭名副其实，菜肴也格外丰厚，大家都兴高采烈。只是年龄已长，对童年的游戏全无兴致，连放鞭炮也没有人张罗。当时，家在冀西山地，民间节庆的喜乐气氛，从“革命”的恐怖和经济的萧条中复苏，反弹出格外热烈的情绪，村村兴兴头头地搞活动，而且花样翻新新奇斗巧。和妹妹一起，到附近的村子，看农民穿着花布龙袍，家做布鞋唱大戏，看纸做的狮子耍舞，看走旱船、走高跷。回想起连年饥荒结束以后的1964年，我家当时所在的县里庆丰收，正月里的小街上盛况空前，各种秧歌和高跷随着锣鼓徐行小半天。当然，由政府组织动员，比民间自发的要豪华得多，但是没有那里民间的质朴纯粹，带给我的感动记忆至今。现在是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，民俗活动在各地都很普遍，适应旅游的需要不按节令。城市里，每天可以看戏、扭秧歌，春节的热闹好像被淹没在日常的娱乐中。鞭炮禁止了好几年，又有限制地开禁，地方戏萧条了一段时间，又火起来占领了各地舞台。加上各种洋式新式的节日层出不穷，连11月11日都是光棍儿节，数着都过不过来。春节几乎又只剩下那一顿团圆饭了，而且，就是挂画、放炮竹、打扑克，也都物是人非。和童年相异的是，睡眠少了，年年都能吃到真正的岁末。我多想像童年那样，早早沉入乌有之乡，和隔世的亲人吃一顿饭，哪怕只是黄粱一现，马马虎虎也是天大的福气。

哦，遥远的春节！

着这座城市，想起自己8年的时光；想起这座城市带给我的不幸与幸运、欢乐与悲伤；想起这么多年没有回家；想起还在路上的父母，他们来过这边过年，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。这座城市对于我有着太多的情感，它已慢慢地在我的心间扎根，我习惯了它的节奏它的尖锐，它带给外来者的疼痛与喜悦，我慢慢地融入这座城市之中。而在父母的眼里，我早就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，他们不会说我在东莞，而是说我的东莞，他们认为自己的女儿就是东莞的，就像舅舅在电话中说的那样，你妈去你们东莞过年，你弟弟他们也在，这么多年，你们终于可以在一起过年了。

它应该是我们的东莞。

司机还在说着，他父母过两天也带着他的儿子来东莞过年，然后说起他们村子有多少人在东莞这边，回家过年的人并不多，大家都习惯了在这边过年，或者一家人来这边团聚，父母来去的车都不挤，这边也热闹些，让在乡村的父母看城市热闹的新年。司机的话很多，我是在一边听着。车到了黄江镇区，很热闹很繁华，街头拥挤的人群、商铺……

长途客车司机打电话来说，车到了，你父母下车了。我催促着面包车司机，快点。

父母在前面等着……